

长安之外的韩愈〔*〕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韩愈一生,有过长达十二年的地方经历。各级地方官吏与友人的照顾救济,不仅帮助韩愈显著减轻沉重家累,尤其让他在迭遭政治挫折的背景下而能安然无恙。长期浸润于长安之外的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的见闻乃至其本人主政一方的亲身实践,为韩愈的政治器识培育,从而使其成长为中唐时期一位见识深远、风骨刚健的知识分子,亦起到关键作用。韩愈作诗务求奇险,但真正具有更为持久思想和艺术生命力的,还是那些包含深刻政治内涵,深广人生感慨与深郁诗情诗境之作,那种“自然雄厚博大”的诗歌本色所以在其手中得以回归,同样离不开多次地方生命体验的特殊支撑。

〔关键词〕韩愈;地方经历;生存保障;政治器识;诗歌本色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3.001

李白、杜甫相继辞世后,唐诗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创作低潮,到唐德宗贞元后期,又迎来新的转机。贞元、元和之际,诗坛群英荟萃,其中最能继承李杜精神衣钵的标志性人物,是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调张籍》)^[1]韩愈自觉以李杜为榜样,但是在一个盛世已远、纷扰动荡的时势中,想要重现辉煌实属不易。与韩愈同时或稍后的孟郊、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李贺诸家,固然都从各自角度为唐诗表现天地的拓展特别是气象风骨的延续作出特殊贡献,但若论直接步武李杜诗歌,尤其是最大可能再现李杜诗歌的浩荡元气,他们都不如韩愈。^[2]韩愈所以能独当大任,

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譬如其“七岁属文,意语天出”(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3]的聪颖天资,又如其长期未曾远离政治主潮,甚至亲身参与德顺宪穆四朝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独特个人经历,^[4]此外,丰富深入的地方体验,也是值得重视的因素之一。

韩愈早孤,十一岁起便先后随兄奉嫂在韶州、宣州等地辗转,直至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初入长安应试。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求仕遇挫的韩愈离京先后在汴州董晋幕、徐州张建封幕任职。^[5]贞元十九年因天早上书论事而遭贬阳山令,中经移官江陵法曹参军,宪宗元和元年(806)秋方才回到长安。元和二年夏至元和六年夏,韩

作者简介:王树森,文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地方行政与文学关系研究”(15CZW021)的阶段性成果。

愈在洛阳先后任国子博士分司东都、都官员外郎、河南县令等职。元和十二年,韩愈随宰相裴度征讨淮西,前后半年。元和十四年,正月因上《论佛骨表》触忤唐宪宗,被贬潮州刺史,十月量移袁州刺史,次年十一月始至长安就国子祭酒任。此后除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以兵部侍郎职短暂出使镇州宣慰藩镇外,韩愈再未离开长安。由此看来,即以初次赴进士试的贞元二年为起点,韩愈成年后至少有十二年的时间是在长安之外的地方府县中佐幕、从宦,或实际主持一方政务。尚不计他干谒、交游各地地方主官的情况。尽管与李白主要在地方上活动、杜甫安史之乱以后长期漂泊陇蜀江湘的情况相比,韩愈的地方经历并不持久且不够集中,但无论是个体生命之保障,还是政治器识之培育,还是诗歌格局的阔大,都离不开他的一段段镶金嵌玉般的地方经历。

一、在长安之外获得生计保障

无论是与李杜等前辈相比,还是与元白刘柳等同时代人相比,韩愈都可说是生于一个中落之家。后世李商隐回忆自己少年时扶父亲灵柩返回荜阳故里时的凄惨情状:“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6]可谓字字如血,但商隐此前毕竟还有过一段随父佐幕江南的安定生活。而韩愈本来或即庶出,^[7]年方三岁其父韩仲卿亡故,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8),抚养他的长兄韩会因受元载案牵累,在抵达韶州刺史贬所不久后又含恨而逝。所谓“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祭十二郎文》),是韩愈关于早年生活的痛苦记忆。韩会离世后,作为“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同前)的叔父,韩愈过早承担起支撑门楣的重任。再至后来,自己也已婚娶生养的韩愈依然需要照料寡嫂孤侄乃至孙辈,甚至在其流贬播迁之时,仍需携老扶幼。一再体尝“少者歿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同前)的人伦悲剧。可以说,长期的生存之困,始终是摆在韩愈面前的首要难题。

为了解救家累,韩愈很早即认识到“苦家贫,

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答崔立之书》)的道理,甚至甘愿承受“苟容躁劲,不顾其躬;禄仕而还,以为家荣。奔走乞假,东西北南”(《祭郑夫人文》)的屈辱,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即便其已然考取功名,并一再向上申述其“居穷守约”“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上宰相书》)之恹惶情状,除了贞元三年因平凉劫盟事件罢职赋闲的马燧念及旧情曾有过“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殿中少监马君墓志》)的表示外,^[8]京城显贵从来都对其苦寒充耳不闻,更鲜有实际救济。倒是地方上的节帅令守,以及他在相关地方所结交的友朋,会及时伸出援手。

“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县斋有怀》)既然长安无所容身,所谓“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又终究是负气之词,韩愈只能在地方上寻找机会。恰好贞元十二年末与韩愈叔父绅卿有旧的大将董晋奉命担任宣武军节度使,遂将其辟为节度掌书记,而且不久为其向朝廷请得节度观察推官守秘书省校书郎的正式职务。汴幕三年,韩愈对董晋是充满感激的,“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为乎浚之都?小人之怀惠兮,犹知献其至愚;固余异于牛马兮,宁止乎饮水而求刍?伏门下而默默兮,竟岁年以康娱。时承闲以获进兮,颜垂欢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穷兮,又何忠之能输。”(《复志赋》)有的观点认为这段文字也暗示韩愈不满于幕吏生涯,但考虑到韩愈当时遭“负薪之疾”(《复志赋序》)的作赋背景,可知不满之意其实并不明显。贞元十五年董晋病逝、宣武军形势再次落入动荡,因送董晋灵柩归葬而一度不知乱中妻小消息的韩愈,不仅得到时任河阳节度使李元淳的接待:“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而且不久又为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收留。韩愈在徐幕,虽然不满于作吏的各种限制,^[9]甚至不时露出“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洟澜”(《凝竚》)的失意,但“酒肴虽日陈,感激宁为欢”云

云,又表明因为有张建封的接纳,韩愈至少免受冻馁之患,而实际上在引韩愈入幕的同时,张氏对其家小也作出妥善安置。《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中云:“仆射南阳公(按:指张建封),宅我睢水阳。筐中有余衣,盎中有余粮。”后来当李翱动员让其去长安发展时,韩愈以“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与李翱书》)回应,表达了他的顾虑,这从反面证明韩愈在徐幕的生活有起码保障。^[10]更何况,在汴、徐幕的几年里,缘于地理相近,加之地方主官提供的条件,韩愈与张籍、孟郊等人交往日密、情谊愈深,韩愈的子侄辈还曾因为这些友人的牵线搭桥而陆续归宁,^[11]所有这些,无疑都如雪中送炭,为韩愈减轻了生存之困。

韩愈后来终于去了长安,屡有任职,但从《苦寒》等诗可见,其家累依旧沉重。贞元十九年,韩愈因论天旱事遭贬阳山令。尽管他早有“从伯氏以南迁……逾南纪之连山”(《复志赋》)的体验,对岭南并不陌生,但以戴罪之身,“龟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个体精神的煎熬与一家生计的忧虑不免萦绕于心。不过往返阳山前后三年,诗人的际遇并非如其预见的。还是在赴阳山路上,郴州刺史李伯康便对韩愈热情款待,抵阳山任后,二人又互有馈赠。等到北返经停郴州,李伯康又盛宴慰抚。李氏的善举,韩愈后来深情追忆:“辱问讯之绸缪,恒饱饥而愈疾。接雄词于章句,窥逸迹于篆籀。苞黄甘而致贻,获纸笔之双贾。投《叉鱼》之短韵,愧韬瑕而举秀。俟新命于衡阳(按,指衡山之阳,即郴州),费薪刍于馆候。空大亭以见处,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于纵博,沃烦肠以清酎。”(《祭郴州李使君文》)令阳山期间,他不仅与时任连州司户参军的王仲舒宴饮、游赏,结下深交,^[12]而且和岭南僧俗各界广有交游。“昨者至林邑,使君数开筵。逐客三四公,盈怀赠兰荃”(《送灵师》)虽写的是僧侣灵师在岭南所受的礼遇,但

韩愈固亦参与其中。遇赦北返并沿途续有任命期间,他于郴州、衡州、岳州、江州一路受到各地主官的殷勤顾遇。由于韩愈认定此次遭贬是因朝廷内党人的进谗,故对于这些主官各种“为余扫尘阶,命乐醉众座”(《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的示好之意,^[13]无疑感念于心。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回到长安,但长安的形势与韩愈的个性仍然格格不入,“得闲无所作,贵欲辞视听”(《东都遇春》),流露出无所用处的百无聊赖,而“为生鄙计算,盐米告屡罄”(同前)的家累益沉,到元和二年的赴任国子博士东分司仍未有根本改观。所以即便因遇谗而不得不离雍就洛,但对韩愈而言,未尝不意味着有新的纾解可能。果然,时任东都留守郑余庆以及河南尹房式均有文才和吏干,对韩愈比较赏识或支持,“幸蒙东都官,获离机与阱”(同前),加之包括裴度、皇甫湜、樊宗师、卢仝等友人此时都因各种原因聚集在洛阳附近,李贺也于此间结识,一种“我来亦已幸,事贤友其仁”(《酬裴十六功曹巡府驿途中见寄》)的自得,确实给久罹宦途之苦的诗人带来了一定的放松。

元和七年韩愈返回长安,一路升迁至中书舍人的高位,尤其是随裴度征淮西建著功勋,境遇大有改善,甚至在长安置产,“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示儿》)然而元和十四年,他因上《论佛骨表》直接触忤宪宗本人。^[14]此次,宪宗的处置极为严厉,不仅贬韩愈为潮州刺史,而且令其家属必须随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挈圻铭》),直接导致其幼女病夭商山驿道。如此形势,不得不让韩愈产生葬身南荒北返无由的绝望。但是,诗人一家尚在衡湘之间,便收到并无隶属关系的时任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命人送达的行仪;已近病笃且之前彼此因永贞党事难免存有心结的柳州刺史柳宗元亦致书慰问;^[15]其家眷也止步韶州,受到当地官员的妥善照顾;及至潮州任所,顶头上司岭南节度使孔戣又“特加优礼,以州小俸薄,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

使钱充者。”(《潮州谢孔大夫状》)在潮州半年,贾岛、刘叉等故人均有诗寄赠,^[16]而老友张籍竟然“使人自京师南走八千里”(《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专程请韩愈为其岳父胡珣作碑志,信任看重之外自有探视资助之意。元和十四年十月底,诗人量移袁州,获知消息的韶州刺史张蒙随即致信祝贺。一年后,诗人结束袁州刺史任职,由豫章、九江一路向北,持续得到王仲舒、李程、萧存、周君巢等沿途官员的顾问。“北望詎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将经贵郡烦留客,先惠高文起谢予。”(《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不可否认,韩愈的得以生还,根本是由于皇权的宽宥,但是由长安往返潮州一万多里的辛苦旅程,以及谪居远守的艰难处境,如果没有那些过路官员友朋的照料,即便侥幸免死,精神上的孤寂落寞必然会沉重不少。

二、在长安之外提升政治器识

前后十多年的远谪外任,得益于多地官员的救济,韩愈终于免遭不测之境。而长期浸润于长安之外的地方社会文化环境的见闻乃至其本人主政一方的亲身实践,为韩愈的政治器识培育,从而使其成长为中唐时期一位见识深远、风骨刚健的实干型知识分子,尤其起到关键作用。

韩愈家族观念很强,对其祖上的功业也很看重。韩愈少失怙养,但是父、祖两辈在地方上的事功,尤其是长兄如父的韩会在江南的声名际遇必然给他带来极为深远的方向指引。后来韩愈追忆自己二十余年的学习经历,强调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答李翊书》),就是自觉以其先辈所奉行的圣贤之道为人生准则。韩愈又说“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争臣论》)而他自己很早即旅食长安“以求斗斛之禄”(《祭十二郎文》),自己在担任阳山令、河南令、潮州刺史、袁州刺史期间又多能积极

作为,相关选择与表现,论其远源,不能不首先追溯至其家族的影响。

对于韩愈来说,家族的荣光固然让其追念,但现实中给他带来直接政治影响的还是各级地方官员。尽管韩愈在长安勉力干谒权贵,但“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出门》),面对“劳思长怀,中夜起坐,度时揣己,废然而返”(《上考功崔虞部书》)之现实,诗人除了远离别无选择。而地方上的阅历,则为他的政治器识的培育提供了难得契机。

仅据粗略统计,韩愈一生结识的有名有姓的地方官员(既包括行政首长,也包括属从)即不下五十位。其中董晋、张建封、王仲舒、郑余庆、房式等地方大员均与韩愈有十分密切的人事关系。任张建封徐州幕掌书记时,韩愈曾言:“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毗,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徐泗豪(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虽然满是自谦,但说明近距离接触地方大员,在他们麾下工作,会使自己有条件更加深入地了解地方行政详情。这些地方官吏的具体行政表现,无论善恶,都能为韩愈所深知。对于那些善政,韩愈不吝誉词,对于相关弊行,韩愈也敢于发表谏议。韩愈为幕主董晋所撰《行状》,^[17]除了详细回顾了董晋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精炼总结他在宣武军任上的政绩:“职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鹄集,苍乌来巢,嘉瓜同蒂联实。四方至者归以告其帅,小大威怀。有所疑,辄使来问;有交恶者,公与平之。”在为王仲舒所撰《神道碑》中,韩愈重点提到王仲舒元和之后在婺州、苏州任刺史时的善政,对其任江南西道观察使时的整顿吏治、禁绝浮屠、救赎民众等举措尤其予以详述,并称“三年,法大成,钱余于库,粟余廩,人享于田庐,讴谣于道途”。对照韩愈自己在阳山任上的“政有惠于下”,在河南令任上的“日以职分辨于留守及尹,故军士不敢犯禁”(李翱《韩公行状》),

尤其是他在潮州、袁州等地的一系列兴利除弊之举，^[18]前后影响痕迹明显。在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少有的实干家，这种实干除了在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表现，也应包括其在地方上的作为。韩愈每任临民长官虽时间均短，却能迅速打开局面，成绩斐然，这无疑与他对相关地方大员的施政举措的自觉学习密不可分。

除了在机遇来临时主动将学习所得付诸实践，韩愈更善于对地方上的经历见闻进行思考，付诸文字。这是他一系列重要哲学和政治论文得以产生的关键外因。韩愈早年在长安，不仅求仕遇挫，精神上也难遇知音。“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惧也不敢复进”（《与陈给事书》），道出了韩愈的苦闷。即便在地方上生存环境显著改善，但对于发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韩愈不能不心怀犹疑，以至于同在河南附近的挚友张籍都径直对他的相关表现提出批评。《新唐书·韩愈传》云：“籍性狷直，尝责愈喜博衷及为驳杂之说，论议好胜人，其排释老不能著书若孟轲、扬雄以垂世者。”^[19]针对张籍的批评，韩愈连作二书予以回应。但“比之酒色，不有间乎”（《答张籍书》）的自我辩护外，^[20]一定会被张籍对他“意欲推而纳之圣贤之域，……谓愈之质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导其所归，溉其根，将食其实”（《重答张籍书》）的期待所触动。韩愈文集中，有《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行难》《对禹问》《杂说》（四首）《读荀子》《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一组哲学论文，作年一直存疑。但各种议论之中，似以宋人张舜民所作的推论：“张籍尝劝愈排佛老，不若著书。愈亦尝以书反复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21]最为合理。^[22]因为在那样一个相对从容的地方文化环境中，周围有张籍这样的志同道合者的推重勉励，韩愈才有可能深探力研，集中写作，他的“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之道”（同前）的自我判断，也才有了最有力的支撑。

有唐一代人才喷涌，唐前期最高政治集团的

摆脱旧家大族权力束缚的努力与下层文人冀图一为所用的呼声总体合拍，形成“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的彬彬之盛。但是安史之乱以后伴随王朝实际控制范围的缩小，加之朝政日趋腐败，君主往往缺少不次用人尤其是长期坚定正确用人的胸襟胆识，即便科举制度的具体操作日渐成熟，但实际上优秀人才大量遗落。韩愈对此忧愤冲冲。著名的《杂说》四首、《师说》《进学解》等文，尖锐地提出当时极为严峻的人才问题。韩愈所以能如此，固然有其本人“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的个人体验因素在，更多则源自他在地方上的经历见闻。

贞元十五年，韩愈在徐幕，了解到寿州属县安丰有隐士董召南，对其“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门外惟有吏，日来征租更索钱”（《嗟哉董生行》）的凄苦遭际深致嗟叹。也正因为此，他对董氏后来去游河北的选择，才表示充分的理解，而且发出“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哉”（《送董邵南序》）的感叹，警告当政者如果不能尽力延揽人才，那么将不得不面对人才皆为割据者所用的风险。除了批评朝廷不能任人唯贤的现象外，韩愈对一些地方长官积极发现人才的善政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欧阳生哀辞》中，韩愈突出表彰了德宗初年福建观察使常衮就任后对于“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者”，皆能“亲与之为客户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的积极举动。由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均为其所见闻，韩愈本人在发现荐举青年人才上也能主动作为。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阳山后，与区弘、区册、窦存亮、刘师命等南方青年士子交往密切。面对士子们的“相从问文章为事”（《答窦秀才书》），韩愈更是“倒廩倾囷，罗列而进”，可谓倾囊相授。后来任河南令，主持府试选拔人才，韩愈不仅撰写著名的《讳辩》为李贺应试扫除障碍，而且对扬之罍、吕昫等青年人都极尽礼遇。在潮州刺史任上，韩愈更是大力兴学，培育人才。在韩愈看来，

“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潮州请置乡校牒》),是一种失职。除了自己亲力亲为,韩愈更利用自己的人事基础向各种上层人物大力举荐人才。韩愈与东都留守郑余庆屡有工作交集,“三为属吏,经时五年”(《送郑十校理序》),^[23]原先依靠宣武军行军司马陆长源的孟郊在汴州骚乱、长源被害后能辗转得为郑余庆所汲引,就缘于韩愈之举荐。元和初,韩愈为孟郊亲写《荐士》长诗,备述其穷困之身、雄骜之材:“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奰。敷柔肆纤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后来郑余庆果然辟孟郊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元和九年郑氏转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又辟孟郊入幕。尽管孟郊道卒,^[24]但是这种招纳,显然说明郑余庆对韩愈的推荐是充分重视的。《与祠部陆员外书》一文,题又作《与祠部陆员外荐士书》,作于贞元十八年,时韩愈由徐幕归京任国子四门博士不久,文中一次性向当时协助中书舍人权德舆主持科举考试的陆惨荐举了侯喜、侯云长、李绅等十位青年文士,后均登第。这些都说明韩愈在地方上始终注意人才问题。正因为很早即认识到“伯乐之厩多良马,卞和之匱多美玉”(《送权秀才序》),且自己又经历过太多人才因为没有伯乐而沦落的现状,^[25]他才能发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杂说》之四)的警世恒言。

中唐政治波谲云诡,影响而及文士的进退向背,选择往往是艰难的。但是统观韩愈一生的政治实践,会发现无论其个人遭遇过何等升沉穷通,他基本上站在历史的正确一方。这种非凡见识的获得,同样来自他在地方上的历练。

韩愈早年生计困顿,不仅由于家道中落,也与当时全社会的经济危机密不可分。佐汴、徐二幕期间,虽然自己免于饥寒,但对下层民众的生存之艰有了近距离观察。佐张建封时,他在多封诗文中对地方军阀的骄奢淫逸、不恤民瘼痛切陈词,但效果有限。贞元十九年的天旱人饥,既缘天灾,更是长期的人祸所致。《资治通鉴》卷二

三五“贞元十二年六月”纪事云:“初,上(唐德宗)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羨余’,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利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十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济源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及(宣歙观察使)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26]陆贄罢相后,裴延龄、李锜等奸臣,更是为“以贡献固主恩”而发展到“恃此骄纵,无所忌憚”^[27]的地步,及至王叔文等人初用事,同样为了专擅财权而将杜佑放到诸道盐铁转运使的要职上。所有这些,韩愈都不能无所与闻。早在贞元十六年,出使长安归来的韩愈在其《归彭城》诗中即记录过“前年关中旱,闾井多死饥。去岁东郡水,生民为流尸”的惨状,并说自己要刳肝沥血以进短策。中唐藩镇骄纵,韩愈在汴、徐等地,即亲身领教军队作乱的厉害。而他在河南令任上,更是直接与不法的地方军士展开正面较量,其事具载《上留守郑相公启》一文。而据皇甫湜《韩愈神道碑》,韩愈当时整肃的矛头,即直指各地藩镇置于洛阳的留守人员的乱纪行为,“将挝其禁,以壮朝廷”,消息传至长安,甚至引起一直有意根除藩镇毒瘤的宪宗皇帝“韩愈助我者”的赞叹。韩愈后来在对待平定藩镇问题的旗帜鲜明和积极参与,显然是其自身思考与实践的必然延续。至于佛教问题,早在汴幕期间,韩愈就在实践中触及僧侣的社会危害性。阳山令期间,韩愈与灵师、惠师等僧侣多有往来,在肯定他们有才学的同时,也直率表达“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淳”(《送惠师》)的态度。如果说此时韩愈与僧侣之间还属于相安无事的状态,那么元和三年任祠部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具体介入宗教管理事务后,就开始与佛教势力正面碰撞。皇甫湜云:“(韩愈)除尚书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号功德使,司京城观寺,尚书敛手就职。先生按《六典》,尽索之以

归,诛其无良,时其出入,禁哗众以正浮屠。”(《韩愈神道碑》)由于约束僧道直接牵涉到背后的宦官势力,加上此后在佐裴度平淮西时逐渐意识到宦官势力的祸害,所以才会对宗教问题有深一层判断。《论佛骨表》中,韩愈不仅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论述崇佛的虚妄及危害,尤其尖锐地警告唐宪宗,假如不能改弦更张,必然会加重“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社会危害。由此可见,在反对崇佛这个重要问题上,韩愈有一个认识逐步提高的过程,而提高之得以形成,与他长期在地方上的见闻经历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三、在长安之外回归诗歌本色

清人赵翼曾这样评论韩诗:

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唯李、杜二公。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奇险求昌黎,转失之矣。^[28]

赵翼对韩诗务求奇险自有得失的判断,尤其是指出“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无疑是“平心读之”所得出的不刊之论。不过仅从艺术经营上的求新求变推究其因,未免有隔一间。实际上,“一个诗人,需要不断地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养其肺腑,扩其胸臆,然后才能发出惊风雨、泣鬼神的声音。”^[29]李杜的成功,本质上正是由于他们对盛唐那个特殊时代的广阔生活介入体会深刻。韩愈着意追求的诗歌创新失大于得,同样因为那些“以文为诗”“善押强韵”的作品大多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及其本人命运遭际距离稍远,甚至是专以逞才摘藻为

旨。三百多首韩诗中真正具有更为持久思想和艺术生命力的,还是那些包含深刻政治内涵,深广人生感慨与深郁诗情诗境之作。韩愈一生中的地方生活体验,正是“自然雄厚博大”的诗歌本色在其手中得以留存发扬的重要支撑之一。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政治江河日下,韩愈因为少年时代的南北奔走,以及成年后辗转多地干谒求援,对当时的社会面情状有了直观体察的机会,因而还是在很年轻时,他就写出了诸如《烽火》《古风》《岐山下二首》等诗,反映了当时的王朝内外形势,特别是民众赋役沉重的生存状态,表达自己对于最高君主勤理康俗的期待。贞元十二年后,诗人佐幕地方前后五年,近距离观察当时藩镇首领的骄奢表现,《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等诗,都在铺写府主游宴盛况中,包含着尖锐的政治批评提醒。“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冬狩行》诗中“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等句对西川军阀章彝的责讽。也正是因为及早即见识藩镇的不法不臣表现,所以韩愈后来不仅积极参与董晋平淮西,而且一路作诗,元和十二年出征及回师,诗人连作十七首诗,纪行情形颇类李白的《永王东巡歌》。特别是《晚秋郾城夜会联句》,“平生耻论兵,末暮不轻诺。徒然感恩义,谁复论勋爵”,一抑一扬,将自己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是“激昂慷慨,有中夜起舞之意”(蒋之翘评语),一扫此前在长安联句的叠床架屋之弊。清人俞琰云:“昌黎与东野联句,多以奇峻争高,而此篇独典赡和平,诚各因人而应之也,亦可见公才大之处矣。”其实韩愈此诗之所以超出从前,根本上还是由于韩愈的精神意志在重大军事斗争中得到充分鼓荡,并不只是“因人”“才大”所致。

贞元十九年的阳山之贬,是韩愈正式进入仕途后遭遇的最为凶险的政治失败,^[30]但韩愈缘此而正面领教德顺宪三朝权力更迭之际的险象环生。正如李杜的人生和创作均因牵连进玄肃

矛盾而发生重大转折,^[31]韩愈诗歌的政治分量同样在这场巨大政治角力中得到了关键提升。至迟从贞元十九年所作《题炭谷湫祠堂》诗开始,在前后三四年的时间里,韩愈不断于诗中批判永贞革新前后的朝堂政治,对王叔文、王伾、韦执宜、刘禹锡、柳宗元等党人给予了特别尖锐的痛斥与责讽。《利剑》《君子法天运》《杂诗四首》《射训狐》等诗,均用笔辛辣,尤其是《赴江陵途中寄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永贞行》二诗,对此次贬谪的来龙去脉与自己的心路历程作了极其深入的回顾展露。前诗中“天子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設,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活驴语言写,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十句,矛头直指刘禹锡等永贞党人的谗毁。后诗开头十六句云:“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睚眦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泱泱!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穷形尽相地刻画出二王集团掌权时的狂态,都足以让人看出永贞革新前后的朝堂乱象。尽管从历史的演进看,永贞革新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主导者、参与者在当时急躁以至近乎狂妄的政治表现,特别是不注意团结大多数正直朝臣的自毁长城,是这场革新过早夭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王伾、王叔文二人本身来路不正、居心叵测,挑战了起码的政治伦理准则。作为一个严肃刚直的士人,韩愈较早观察到二王集团渐得大用的态势,对他们种种急功近利、目空一切的做派是深有不满意的,特别是对刘禹锡,他尤其忿恨不已。^[32]诗人对永贞党人的尖锐斥责,决不能仅作保守观,要充分注意到这种斥责背后所包含的对典正政治生态的守护。至于其对诗歌正气的鼓舞激荡,尤应被足够估计。

这场仕途上的无妄之灾,将韩愈内心深处的政治锐气彻底调动出来,不仅催生上述优秀的

政治诗,甚至也给他的其他诗歌注入了政治元气。沈德潜云:“大抵遭放逐,处逆境,有足以激发其性情,而使之怪伟特绝,纵欲自掩其芒角而不能者也。”(《姜自芸太守诗序》)^[33]韩愈诗歌的雄健气势,在其贬阳山令之后,确实有了大的发展。作于元和元年归京后的《南山诗》,素来被认为是韩愈最重要的写景诗之一,尽管前人多以之与杜甫《北征》相较上下,多有不如其评,但如果注意到诗中“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前年遭谴谪,探历得邂逅”“昨来逢清霁,宿愿忻始副”三联的时间提示语,就会意识到所谓写景只是表象,内里还是政治。那连续五十一个“或”字,实在是韩愈内心躁郁之气的喷薄,对于终南山“大哉立天地,经纪肖营滕”的认知与感叹,实质上是一种对刚健政治的极为迫切的向往。《秋怀诗十一首》亦作于由江陵掾初归任国子博士之际,无论是言秋风“策策鸣不已”,还是说“卷卷落地叶,随风走前轩。鸣声若有意,颠倒相追奔”,特别是“上无枝上蜩,下无盘中蝇。岂不感时节,耳目去所憎”(其四)四句,如果与贬谪期间相关诗歌中频频出现的蚊蝇等物象对读,批判以永贞党人为代表的中唐政治上的一种特殊的力量与现象的意思显露无疑。韩愈的态度是否完全正确可置不论,但假如无此经历,韩愈对政治的理解必然不会那么深入,其诗的政治分量自然不会那样厚重,也就自然会失去与李杜这样的前辈大家对话呼应的起码基础。^[34]

韩愈与中唐政治牵连至深,作为一个怀有强烈政治抱负的实干家,他依据自身见闻思考,以诗为媒,就当代政治的各种问题抒怀发论,体现出一个正统文士对于家国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不过作为一个情感细腻的诗人,面对在地方环境中更容易观察体验到自己或他人的升沉穷通、进退冷暖,内心绝不至于无感。欧阳修云:“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与尹师鲁第一书》)欧阳修虽然对韩愈有所批评,

但恰恰说明他意识到韩愈诗歌中的感慨成分是在“及到贬所”之后方才得到增强。实际上,不仅是“及到贬所”,但凡诗人身处地方府县环境,其诗总是多一份动人的感慨。

韩愈早年在汴、徐等幕,近距离体察到孟郊、张籍、董邵南等寒士在谋求个人仕进中的辛苦备尝,“长怀绝无已,多感良自尤”(《远游联句》),《答孟郊》诗从孟郊有盖世文才却难免饥寒的窘迫处境写起,引出“古心虽自鞭,世路终难拗”的无奈感叹。《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以张籍履历以及与自己交往为线索,不断发出历史、社会与人生感慨。如“孔丘歿已远,仁义路久荒,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又如“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再如“男儿不再壮,百岁如风狂。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都是诗人阅世至深沉吟至深的情思结晶。近人蒋抱玄评此诗曰:“惜别是道情之文,然须字字从心坎流出,写得淋漓尽致,便是大家手笔。”^[35]与旧时评家专从用韵角度论析此诗相比,蒋氏专指此诗为“道情之文”,无疑抓住诗的核心。韩愈与孟郊、张籍、李翱等人,后来在长安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尤其是联句,连篇累牍,向为人所诟病。字面的佶屈聱牙之病外,根本上还是精神情感层面的感怀被冲淡。

贞元年间的两佐军幕,给韩愈提供了难得的在观察他人遭际中感叹世道人心的契机,但仅有这种置身事外的观察,还不足以在更深层次上调动诗人的情思。蒋抱玄评《答孟郊》云:“光坚响切,自是本色,然不逮孟诗之耐人咀嚼也。”^[36]将韩、孟诗对读,韩诗之所以出现蒋氏所谓虽是本色却“不逮孟诗之耐人咀嚼”的问题,就是因为韩愈连佐军幕虽然不算得志,但总归有所保障。孟郊等人之遭遇,韩愈虽有同情,但还没有发展到感同身受、体贴入微的程度。贞元末年韩愈供职长安,虽然时露无所聊赖之叹,《赠侯喜》《山石》等名作,更是对以侯喜为代表的“吾党二三子”的奔波劳碌深致悲慨,但类似后来“声音一何宏,轰轲车万两”(《岳阳楼别窦司直》)这样倒

海翻江的情感巨澜,仍在蓄势之中。而贞元十九年与元和十四年的两次远贬,则使躁劲冲撞的不平之鸣终于喷薄而出。

阳山之贬,一方面让韩愈充分领教了政治的凶险,另一方面让他在本人的巨大跌宕中有机缘品味出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从不见容于当权者的那一刻开始,诗人既不断申斥构陷谗毁之徒的邪恶无情,又处处感念那些施援助力者的真情厚意。既悲慨于自己和同贬者(如张署)的不幸,又欣慰于故雨新知的相守相交。种种复杂的感情不仅具体地体现在像《答张十一功曹》《李员外寄纸笔》一些短章中,尤其复杂地融合于《县斋有怀》《赴江陵途中寄三学士》《岳阳楼别窦司直》这样的五言长篇。《县斋有怀》在历叙自己过往岁月中,尤其注意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诗之开头即云:“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为全诗奠定郁愤不平的情感基调。此后每述一段经历,就会或冠或继以感慨之句。如“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又如“名声荷朋友,援引乏婚嫁”,又如“惟思涤瑕垢,长去事桑柘”。《赴江陵寄三学士》详述自己遭斥缘由与贬谪经历,但仍处处不忘自明心迹。作于从贬所征还途中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针对张署“坎轲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忍说”的嗟叹,诗人更以“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之语相宽慰。显然,若没有贬途上走一遭的经历,诗人定难以有如此深刻的人生体会。

如果说阳山之贬给韩愈的诗歌创作中注入的更多是愤慨,那么潮州之迁则充分释放了韩愈诗歌的悲慨。因上《论佛骨表》被再度南贬,向来被认为是韩愈政治人生的重大关节,但是设身处地,面对宪宗这样一个既有特殊政治建树又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中兴之主,于公于私,韩愈是否有必要如此激烈,不能无疑。事实上,元和十四年南贬之后,诗人不断在有关文翰中检讨自己,“臣以狂妄憨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潮州刺史谢上表》),我们决不能仅认为这是韩愈的刻意自毁

自污,要充分估计韩愈对自己伤害宪宗颜面情感的做法已有痛苦认识。基于这种人生重创以及由此引发的可能确实出乎真诚的歉疚,再加上其本人已过五旬,韩愈对世界人生的认识自然染上一抹悲凉的色彩。曾吉甫《笔墨闲录》云:“(韩愈)潮州以后诗最哀深”,确实,从南贬到北还,诗人一路行吟,悲慨之音随处有闻。元和十四年诗人甫登贬途,即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篇被后人认为足以与《论佛骨表》文双峰并峙的名诗,但是不同于《论佛骨表》的义正词严,诗虽也有“欲为圣明除弊事”的自辩,但更多是在“情极凄感”和“语极凄切”中表现出“其感深矣”的悲慨。《过始兴江口感怀》诗云:“忆作儿童随博士,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程学恂谓“此亦寻常追感”,但抚今追昔、怀念亡兄、致歉亲人、孤独自伤,多种悲情交集,平平道来,自能催人泪下。由于韩愈对自己触忤宪宗确实怀有不忍(无论是初贬时《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还是作于南方的《泷吏》《别赵子》,都与杜甫《北征》开头一段文字所抒发的矛盾彷徨情绪相类),对自己的遭贬确有罚当其罪的认识,“我昔实愚蠢,不能降色辞”(《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不管从政治上看韩愈的这种认识带有如何软弱退让的历史局限,都必须认识到已至垂暮的诗人在回顾自己过于注重参与政治而难免对至亲冷暖安危照顾体察不够的一生经历时,精神上所受到的煎熬。“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默然都不语,应识此时情”“陆孟丘杨久作尘,同时存者更谁人”,^[37]这些诗句,无不反映出一个本质上仍是文人的封建时代的政治人物内心深处的纠结凄楚。明乎此,再去读那首《去年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遭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留题驿梁》:

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
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
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
百年惭痛泪阑干。

长篇近序。诗人远贬,家属随迁已属连累,然而尚未成年的幼女却因此夭折,只能草草寄葬于路途之中,身为人父却不得亲自料理后事,^[38]只能等到自己从贬所回归时才能追补祭仪。这实在是极为惨痛的人伦劫难。韩愈的名篇《祭十二郎文》固然也满纸血泪,“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云云,固然也反映出韩愈为了亲情可以不顾名位的内心款诚,但十二郎毕竟是侄儿,且祭拜之深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报答兄嫂的心理考量与家族乏继的社会考量,而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韩愈仍处在“利欲斗进……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人序》)的状态而不愿有所折让。但挈女实为韩愈骨血,道死商山又完全是因己而致,“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岂不缘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托依。人谁不死,于汝即冤。”(《祭女挈女文》)这种巨大的心理折磨,对于一个父亲,是如何估量也不为过的。正因为此,韩愈才会向着荒郊矮坟真诚谢罪,也正是在这里,韩愈内心深处的悲慨,才得到深入骨髓的展示。

韩愈在长安,或拘于政务繁剧,或缘于友朋社交,真正亲切可感、打动人心的诗歌是有限的。那些极具标识度的联句,韩愈用力极重,“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兵”(《城南联句》),以至于调笑戏谑,虽然不可与一般游戏文字等量齐观,但是正如胡震亨所云:“韩公挺负诗力,所少韵致,出处既掉运不灵,更以储才独富,故犯恶韵斗奇,不加拣择,遂致丛杂难观,得妙笔汰用,瑰宝自出。第以为类押韵之文者过。”^[39]情感不免稀薄。只有在长安环境之外,或甫由外地入归长安之际,其诗自然醇厚一面特质,才能得到更好彰显。

韩愈入仕之前的诗歌,篇幅较短,饶有古意。朱彝尊评其《青青水中蒲三首》:“语浅意深”,何焯则评曰:“三章真古意。”^[40]《古风》《杂诗》等作,仅从题目上就可见诗人对古诗的自觉学习。何焯曾云韩愈青年时诗,“诸短章音节极古,且多用比兴,直所谓突过黄初也。”^[41]虽然从内容上

看,这些诗歌未免显得缺少足够的生活底蕴,但是说明韩愈的创作并非一开始就一定以追求奇险为务。后来韩愈经历坎坷,心情长期处在躁动不安中,有论者遂将这种特殊处境心境当作韩愈“不平则鸣”诗学主张与雄桀瑰伟诗歌风貌的主观根源。清人沈德潜云:“大抵遭放逐,处逆境,有足以激发其性情,而使之怪伟特绝,纵欲自掩其芒角而不能者也。”(《姜自芸太史诗序》)但是实际的情况往往要比看似合理的概括复杂得多。检韩愈诗集,那些最能反映出韩愈诗歌意象、结构、语言之刻意求变的篇章,大多是作于其身处长安或洛阳等安定环境中,《会和联句》《同宿联句》《纳凉联句》《斗鸡联句》《石鼎联句》如此,《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如此,那些写身体早衰迹象的诗歌同样如此。将韩愈诗歌的“怪伟特绝”与“遭放逐,处逆境”的个人经历联系在一起,证明效力并不能做到排他性。

真实的情况是,首先,韩愈诗歌中出现的怪怪奇奇甚至阴森恐怖的物象,多为现实中存在的,姑且以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诗人往返阳山途中一系列诗歌为例,《叉鱼》《刘生》《射训狐》《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谴谪鬼》《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岳阳楼别窦司直》等诗,都写了大量南中景物风俗,但这些内容并非韩愈生造想象,他写的更多属于实录。其次,作者铺写南中风物,目的不在于猎奇,而是抒发自己的复杂情感。《岳阳楼别窦司直》共八十八句,真正涉及南中风物给人以生新感受的只有“炎风日搜搅,幽怪多冗长”“江豚时出戏,惊波忽荡漾”“时当冬之孟,隙窍缩寒涨”六句,著名的“潞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声音一何宏,轰轲车万两”等句,仍是宏观概括,其他则全为描写友朋殷勤款待与诗人内心情感抒发,而且也难见玮词怪语,更没有繁琐堆砌,与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江夏赠韦南陵冰》等诗并无本质不同。再次,韩愈在地方

上写下的一系列叙情长篇如《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县斋有怀》《赴江陵途中赠三学士》等,均是以情驭文,古今评家多取其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长诗对读,探析其前后艺术经验之继承。朱彝尊评《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中诗人归徐途中“东南出陈许,陂泽平茫茫。道边草木花,红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角雄雉鸣”一段景物描写云:“要知此间点景,方是诗家趣味。《北征》诗‘或红如丹砂’等句,亦是此意。”^[42]所谓“方是诗家趣味”,充分表明韩愈对古典诗歌的写情传统深怀敬畏,所谓“惟陈言之务去”,绝非不分场合。

长篇之外,韩愈在地方上的一系列短章尤具浓郁真厚的诗情诗味。《笔墨闲录》:“潮州以后诗最哀深。《次宣溪》(按,题为《晚次宣溪辱韶州张端公使君惠书叙别酬以绝句二章》)绝句等诗,绝有味。”^[43]元和十四年后,韩愈诗歌中的近体律绝显著增加。无论是《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还是《次邓州界》《食曲河驿》《送桂州严大夫》,字面上的平易之中都蕴含着极为深厚的个人情感。《题楚昭王庙》诗:

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

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

清人何焯评曰:“意味深长,昌黎绝句中第一。”又云:“近体即非公得意处,要之自是雅音。”^[44]朱彝尊评曰:“若草草然,却有风致,全在‘一间茅屋’四字。”^[45]蒋抱玄曰:“未是快调,却能以气势为风致,愈读则意愈绵,愈嚼则字愈香,此是绝句中杰作。”^[46]不仅如此,即便是那篇有戏谑意味的《泷吏》,有的评家也看出其中的自然情味。朱彝尊评此诗云:“语调全祖古乐府来。大约作此等诗,专以才力运,一毫雕琢藻绘俱使不得。”^[47]查慎行云:“通篇以文滑稽,亦《解嘲》《宾戏》之变调耳。特失职之望少,而负慝之意多。”^[48]沈德潜评曰:“借吏言以规讽,自嘲亦自宽解也。从古乐府得来,韩诗中之别调。”^[49]由潮州北返途中,韩愈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昔实愚蠢,不能降色辞。子犯亦有言,臣犹自知之。公其务贯过,我亦请改事。

桑榆倘可收,愿寄相思字。”(《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大夫》)《唐宋诗醇》评曰:“情致缠绵,词气逊顺,使人之意也消。”^[50]韩愈诗意在追咎过往政治活动中不知通融的性格弱点,其实经历一番曲折,其从前争强好胜的文艺心理终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检讨与放弃。

明乎此,再去看他归返长安后的《石鼓歌》与《早春赠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会发现有意逞才炫博的成分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则是深挚隽永的人生情感。韩愈本擅碑志,按说《石鼓歌》是一个很容易展露其才学背景的题材,但韩愈却有意识将专业性的背景知识交代作了最大限度的压缩,使整首诗显得既酣畅淋漓又富有情韵,有强烈的社会人生感慨。清人方东树评曰:“诗文之瑰怪伟丽为奇,然非粗犷伧俗,客气矜张,短钉句字,而气骨轻浮者,可貌袭也……又如韩、苏(轼)《石鼓》,自然奇伟……东坡《石鼓》,飞动奇纵,有不可一世之概,故自佳。然似有意使才,又贪使事,不及韩气体肃穆沉重。”(《古诗选批》)再看《早春赠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
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张籍是韩愈最重要的诗友之一。在韩愈投入巨大精力的联句活动中,张籍是最关键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韩愈的“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调张籍》)的诗歌雄心,也是向张籍吐露的。然而当诗人在经过无数风波重回长安之后,却以如此小诗小景与老友共享,这正是向诗歌本色的回归。诗人赞美长安绝佳春色,是在自己经历过太多坎坷曲折,方在比较中得出的结论,而弃瑰伟而转清醇,无疑也意味着韩愈在一番左冲右突之后,重新找到诗歌的应有本色。“夫文与诗,赫然两体,不可相溷也。”^[51]章士钊对韩愈往往批评过甚,甚至认为韩愈并非以文为诗,而是“不能为诗”,诚然有其偏颇处,然而,正如今人所云:“是诗,就要有诗

情、诗味,要有诗的情韵、意境和风神。”^[52]韩愈一生,在诗体经营上展开各种实践,“以文为诗”孰为得失,长期聚讼纷纭,今后恐怕仍会继续争论下去,然而韩愈本人从少及老的几番转圜,不能不引人沉思。而这种转圜,又常常与诗人出入长安的个人时空转换相联系,无疑就是更应引起注意的诗歌现象。

注释:

[1]按,本文所引韩愈诗文,均据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和马其昶《韩愈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录文,不再重新出注。

[2]叶燮《原诗·内篇上》言六朝以后诗:“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王、孟、高、岑、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能创。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页)叶氏将韩愈列入杜甫之后的杰出者,与其他中晚唐诗坛的“专家”区分开来,大体符合实际。

[3][清]董诰:《全唐文》卷六八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19页。

[4]元稹、白居易都是在元和初年方才登上诗坛,而柳宗元、刘禹锡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无非就是参加永贞革新,在此之后,实际与政治主潮远隔。

[5]这段经历,韩愈在《县斋有怀》诗中有比较详细的追忆。

[6]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14页。

[7]参见卞孝萱、张清华、周琦:《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章第三节“生母之谜”。

[8]贞元二年,吐蕃在平凉劫盟,大肆屠杀、俘虏唐朝使团人员,其事见《资治通鉴》卷二二二,遇害的唐方人员中,有韩愈从兄韩弇。韩弇事迹,见李翱《韩(弇)君夫人韦氏墓志铭》及小说《河东记·韩弇》。

[9]韩愈曾向张建封坦陈:“凡执事之择于愈者,非为其能晨入夜归,其所取者犹在也。”(《上张仆射书》)这种情绪,颇类于杜甫广德二年(764)后正式进入严武幕府的心理,有其《宿府》《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等诗为证。

[10]韩愈在《与卫中行书》中言:“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这也说明在汴、徐等地,韩愈的经济状况有了显著改善。

[11]韩愈的几位侄女即分别嫁给李翱、张彻、周况。李翱说韩愈:“与人交,始终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无主者十人。”(《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全唐文》卷六三九。)

[12]参见韩愈《燕喜亭记》及他为王仲舒所撰之《神道碑》《墓志铭》。

[13]时任江陵节度使裴均对韩愈的善待,甚至在多年以后还被当作政敌攻讦韩愈的重要理由,《旧唐书·韩愈传》云:“俄有不悦愈者,掘其旧事,言‘愈前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钅钅郇鄙,近者钅钅还省父,愈为序饯钅钅,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14]当年论天旱贬阳山,韩愈一直认为是党人进谗的结果,唐德宗是被动的。

[15]《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中既云:“英英桂林伯,实惟文武特。远劳从事贤,来吊逐臣色。”(其二)又云:“巖巖桂林伯,矫矫义勇身。生平所未识,待我逾交亲。遣我数幅书,继以药物珍。药物防瘴病,书劝养形神。”(其四)又,这组诗的第三、第六首写了柳宗元对他的慰问情况。二人观点的矛盾,柳宗元亦有提及,其《送僧浩初序》中云:“儒者韩退之与予善,尝病予嗜浮屠言,誉予与浮屠游。近阮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予,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屠。’”

[16]分别是《寄韩潮州愈》(贾岛)《勿执古寄韩潮州》(刘叉)。

[17]有关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原题均较长,今一并略写,下同。

[18]李翱《韩公行状》中云:“先生临之,若以资迁。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鲜鱼稻蟹,不暴民物。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直,辄与钱赎。及不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

[1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7册,卷一七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6页。

[20]按,此语出自汉宣帝为王褒作赋的辩护。

[21]转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4页。

[22]按,屈守元根据韩愈相关诗文,又提出这组文章创作时间的另一种可能性:“五《原》思想一贯,当属同时之作。《原毁》云:‘事修而谤兴,德修而毁来’,亦与阳山之贬愤懑之情相符。疑所说‘虔卿正著书’(按,句出《李员外寄纸笔》诗,李员外指郴州刺史李伯康),即指此五文。或者贞元十三年虽辞不为,在贞元十九年冬却如张舜民所推断,有感于张籍之言,激而作之。”(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67页)逻辑上也能说通(毕竟,《五箴》即作于此时,而据《县斋读书》诗所透露的信息,韩愈在担任阳山令时有过比较集中的读书生活)。但无论是作于汴幕,作于徐幕(《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中有“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两句),还是作于贬阳山令后,都说明地方上的有利环境是诗人思考创作的最直接触媒。

[23]按,郑十校理为郑涵,郑余庆子。韩郑之交谊,又见韩愈《上郑相公尚书启》《上留守郑相公启》两文。

[24]参见陶敏、李一飞、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728页。

[25]如《马嵬谷》《苦寒歌》《骓骥赠欧阳詹》等诗,皆涉及这一问题。

[26][2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572、7596页。

[28][清]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8页。

[29]蒋和森:《伟大的时代歌手——杜甫的生活与创作》,《人民日报》1962年4月4日。

[30]有的学者认为,元和十四年贬潮州刺史对韩愈的打击最为重大,但是从韩愈事后的言辞可见,他本人对《上佛骨表》的激怒唐宪宗,是有所后悔的。贬潮州刺史给韩愈心理上造成的震荡,主要是人生的感慨,而非政治的批判。

[31]参见余恕诚:《唐诗风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173页。

[32]从后来刘禹锡在《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诗中的闪烁其词来看,刘禹锡确实在韩愈遭贬一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焯云:“退之诗(按,指《岳阳楼别窦司直》)后半,颇追斥八司马之党,而以之示刘,且要其属和,其亦近于疏浅,且得无益深其怨恨乎。赖梦得辈深于文章,知韩之必不可抑落,亦有内悔而思寻其旧好之意,狡兔于怙兆而凶终耳。然亦可以为强负自遂之戒。”(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转引自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68页。)

[33][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第3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4页。

[34]虽然不能说中国最优秀的古典诗歌都是政治诗,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那些最一流的文字,无论具体书写的对象如何,都很难离开创作者对政治的最大可能的关注与介入。李杜最为优秀的、无可替代的诗歌,还是他们的政治诗。

[35][36][40][41][42]转引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第98、58、23、28、93-94页。

[37]分见《答柳柳州食虾蟆》《次石头驿寄江西王十中丞阁老》《又寄周随州员外》。

[38]汪佑甫《山泾草堂诗话》曰:“《祭文》(按,指《祭女挈女文》)云:‘我既南行,家亦随谪。’考《女挈女铭》云:‘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挈之死于商南层峰驿,在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细味两‘既’字,是韩公先行,谪与祭不及亲临,至明年冬,自袁州归,始作文祭之。所以此诗有‘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盂’二句。”

[39][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5页。

[43][44][45][46][47][48][50]转引自《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下册,第1121、1108、1108、1108、1118、1108、1187页。

[49][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3页。

[51]章士钊:《柳文指要》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页。

[52]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上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